
September 2015

A Discussion of "Off-Site Requisition" in Literary Theory

Guoqiang Qi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Qiao, Guoqiang. 2015. "A Discussion of "Off-Site Requisition" in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5): pp.67-7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5/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试谈文论的“场外征用”

乔国强

摘要: 自 20 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有一个发展趋势,即文论在借跨学科之际逐步模糊了其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与此同时,文论也越来越多地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似乎有文论被其“绑架”之势。张江先生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场外征用”的缘故,故而提出让文论回归到文学自身,坚持系统内部自我发育的原则。本文对这种“纯粹”理论的观点不完全苟同,认为文学理论从其肇始开始就是“不纯”的。这种“不纯”并非完全是构建者的有意为之。它既是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一种状态,也符合文论构建的需求。

关键词: 场外征用; 纯粹性; 系统发育

作者简介: 乔国强,英国诺丁汉大学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访问教授(2013-2016年),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副主编。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理论以及叙述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电子邮箱: qiaoguoqiang@163.com.

Title: A Discussion of “Off-Site Requisition” in Literary Theory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adoption of methods in 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 contributes to a dominant trend in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at blurs the boundary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es. Literary theory burdens itself with or rather, is “hijacked” by many irrelevant things such as politics, ideologies, moralities, etc. Zhang Jiang believes that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s not “pure” due to the “off-side requisition” and therefore he proposes a return to literature and a re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 This paper presents viewpoints different from Zhang, contending that literary theory is never “pure” from its onset. This “impurity” is not only a natural state of its being but also a reasonable demand in its construction.

Keywords: off-site requisition; pureness; development within a system

Author: Qiao Guo Qiang, Ph. D,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School of Englis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Changjiang Schola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visiting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U. K. (2013-2016), director of Centre for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and deputy chief editor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His research focuses are Americ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literary theory and narratology. Email: qiaoguoqiang@163.com.

引 言

张江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强制阐释论》无疑是一篇颇为新颖和具有颠覆性的文章。该文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以及“混乱的认识路径”四个方面,分析和批判了当

代西方文论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所存在的“根本缺陷”(张江 5)。当代西方文论虽然是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但这些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和理论的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说,这篇文章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当代西方文论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张江先生在文中认为,造成当代西方文论“根本缺陷”的主要原因是“场外征用”,即“各种生发于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的话语中”,从而致使当代西方文论“理论与实践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的分裂”(张江 5)。以我粗浅的理解,张江先生所说的“场外征用”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既指当代西方文论的构建成分,又指当代西方文论的构建方法,即思想与方法的统一。而其他三方面——“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以及“混乱的认识路径”则主要是指方法问题。显然,张江先生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从理论的内在构成以及理论的构成方法出发,反思和批判了当代西方文论构成的不纯粹性和其方法的不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必须坚持系统发育的原则,在吸纳进步因素的基础上,融合理论内部的各个方向和各个层面,建构符合文学实践的新理论系统”(张江 5)。

张江先生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案都很有意义,对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建设与发展具有启发作用。特别是对构建“符合文学实践的新理论系统”的倡议,更为当下缺乏独立自主话语权的中文论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想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自己话语体系理论诞生的,最终摆脱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的模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肯定张江先生这篇文章合理性一面的同时,我也隐约觉得张江先生在论述中所论述到的“场外征用”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所谓“场外征用”,用张江先生的话说就是:“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引导文论偏离文学”(张江 5)。显然,“场外征用”不单纯是个理论术语问题,它还牵涉到如何构建一种理论模式的问题。具体说,这实际意味着一个理论家在构建自己的文学理论时,他能调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权限的问题。

构建文学理论,到底能不能“征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征用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理论,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把其他学科中的理论知识“征用”到文论中来,是不是就一定会导致文学理论和批评偏离了文学自身的航道?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在结合着文论史的发展现状、具体案例分析和理论论证方法的前提下,从文学理论的“纯粹性”、文学实践与文学“系统发育”之间的关系以及文论自身内涵三大方面,分析张江先生所提出的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有关“场外征用”这一话题,借此向张江先生和同仁们请教。

一、从史的角度看中西文论的“纯粹性”

张江先生指出,西方当代文论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因“场外征用”,即“各种生发于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的话语中”,导致了文论中夹杂了许多与文论不相干的因素,从而让原本属于文学“系统内发育”的文论变得“不纯粹”了。

显然,张江先生倡导的文学理论模本是一种“纯粹”性的理论模本,具有为理论而理论的意味。问题是,这一纯洁文学性的想法在实践中是否能贯彻、落实下去?要回答该问题,需要看一下中西文论的发展史,即在过往的文论史上,文论有没有真正地“纯粹”过?

先看一下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正如我们以往所知道的那样,以意境、境界为代表的古代文论看上去超凡脱俗,好像是沿着文学自身的轨迹走的。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文论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相互间的复杂发展脉络就不加以追溯了,但是从无论是儒家文论还是道家文论都格外讲究“天人合一”中不难窥出,中国古代哲学以及古代文化对其的深刻影响。童庆炳先生曾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符号论来解释中文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卡西尔认为,“符号论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就是指蕴蓄在人的‘灵魂’深处的精神文化、观念文化而言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文化并非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一种文化,相反它寄存于人的“灵魂”之中。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童庆炳先生针对中国的古代文论与文化说“文论作为文化‘扇面’的一角,与文化‘扇面’的其他部分是密切相关的”(童庆炳 14)。童庆炳先生借用西方“场外”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文论问题,或许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可以暂且搁置一边,转而从我们

古代文论自身发展的状况入手。

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颇为漫长,但是,儒和道,加上汉代以后才加入进来的“释”,作为哲学理念,几乎融入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每一种学说或论述之中。譬如,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着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在其一开篇中,刘勰就直奔主题说,文是源于道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刘勰 1)。“文”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天地”的,这说明在刘勰看来,文学理论和批评是依附于天地万物的,即与《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难怪他接下来又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刘勰 1)。文学理论与《易》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阐释文学理论当然不是刘勰所独有的特点,相反这是古代批评家的一贯做法,如钟嵘的《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论诗的专著,可以说具有代表性。钟嵘在该书中评价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时,借用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淡,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陈良运 161-62)。该处的“黄、老”就是指道教的始祖黄帝和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显然钟嵘认为永嘉时期的诗人由于过于崇尚道家哲学,从而导致了他们所创作的玄言诗“淡乎寡味”,丧失掉了原来诗歌所具有的“建安风力”。无疑,刘勰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理论的产生与构建的;钟嵘是从具体的哲学流派的视角来评价诗人创作得失的。如果在此借用张江先生提出的“场外理论”来衡量的话,他们两个都“征用”了文学之外的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是一种典型的不纯粹的文学理论。

问题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都是如此的,不但文化、哲学渗透在文学理论中,甚至历史、政治、伦理道德与文学理论也紧密地纠结为一体。如孔子提出的“诗无邪”、“温柔敦厚”等术语,既是评论《诗三百》的理论术语,同时也是对人的道德品质的规定。更为典型的是汉儒董仲舒,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文学理论家。说他是哲学家和政治家是因为在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时,他依据“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的治国策略;说他是

文学家,因为流传至今的“诗无达诂”之说就源于他。如果这些还只主要说明了他的不同身份在不同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这段话,则难以区分开他的身份与话语界限了: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贍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陈良运 45)

董仲舒在这里所提到的“六艺”,原本是用来教化民众的工具,即用《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古代经典著作来熏陶民众知书达理,从而达到对之进行统治的目的。“六艺”无疑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但是,同样在这段话中,董仲舒又把“六艺”自身的艺术特征给概括了出来,如说《诗》道的是“志”;《易》源于“天地”;《春秋》是对“是非”的匡正等,都总结得非常到位。这就说明在当时所谓的文学与政治、历史、哲学以及伦理道德都是不分家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场内”和“场外”之别,显示出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状态。其后的文学理论也大致是沿着这一特质发展和架构起来的。

总之,中国的古代文论是“不纯粹”的,它是文史哲诸种领域之间的混杂。那么,西方的古代文论就“纯粹”了吗?应该说,也是不纯粹的,其文论的肇始与发展与中国文论大致相同,即泛指意义上的文化与文论也是并行不悖的。

西方文论的传统可以远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古希腊学者也像中国的孔子等一样,是全才式的学者,在哲学、政治、文学等方面均开创了一代先河。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可以用理式论来概括,即他的全部文艺思想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如他在论及文学创作时所持的观点是,由“神”或者“王”所造的“自然的床”,也就是所谓的“理式”才是真实、可信的,而诗人们的创作“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柏拉图 390、392)。把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创作都视为是模仿之模仿。这说

明在柏拉图的艺术理论范式中,文学是不可能把真实的世界反映出来的,所揭示的不过是真实世界的幻影。

显然,柏拉图的文学观念与其哲学观念是相互一致的,即他的文学观念受制于他的哲学观念。除此之外,柏拉图所持有的政治理念也给他的文学观念,譬如对诗歌的偏见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是要把诗人驱除出城邦的。因为在他看来,能承担起治理国家这样重任的人是哲学家,而不是诗人。柏拉图为何要把诗人放置于哲学家之下?这当然与诗人所从事的创作有关。与可以一语道破真相的哲学相比,“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危害好人一样”(柏拉图404)。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诗人逐出城邦,就是因为诗人的创作破坏人的理性,不利于政治权力的稳定。

毫无疑问,这种文学观点完全是依附于其哲学和政治观点的。或者也可以说,对柏拉图而言,哲学观点也罢,政治观点也罢,文学观点也罢,它们统统是一回事,根本就没有什么谁不能渗透谁、谁不能影响谁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跟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也是将其哲学思想融入到文论创建中的。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是,他在批判继承其老师的一些思想外,他还开创了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也正因为如此,他格外重视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并有意识地将一些富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引入到文艺问题的研究中。譬如他在其《诗学》中,不但整合了早期希腊哲学家们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观点、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的传统,而且他还往前更为推进了一步,即把生物学的有机整体概念引入到悲剧中来;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观点来讨论悲剧的模仿对象和人物的性格;还从病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宣泄”和“陶冶”等学说。无疑,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成为古希腊历史上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家,就是因为他融合了各个领域中的有益知识,最终铸造出了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

从某种哲学思想出发来讨论文学艺术,并进

而发展成为一种文论思想或体系的例子比比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文论的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种“场外理论”的路数。如亚里士多德之后,开辟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论先河的贺拉斯,他所秉持的文学观点就与“有节制和适度享乐的生活哲学”(亚里士多德、贺拉斯 163)相关联。同时,他还强调教诲要与娱乐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亚里士多德、贺拉斯 155)观点。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这种学科、理论的交叉更为明显起来,可以说几乎每位理论大家都是程度不同地将“场外理论”移入到自己的文学理论中来,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如狄德罗、莱辛、康德、黑格尔、席勒、左拉等均为此。

通过上述的简单回顾不难看出两方面的问题:从文论自身发展看,文论的起势就是由“场外理论”等诸多因素合力而成的,即没有所谓纯文学理论的理论;从文论家构建理论的具体实践看,将“场外理论”移入文论的现象由来已久,并具有普遍性,几乎形成了“没场外,无文论”的局面。基于这一现状,可以说当代西方文论纷纷“场外征用”并不奇怪,不过是其传统基因在发挥作用而已。其区别仅在于“征用”的程度和方法不同,其他并无什么更本质区别。

二、从文论的内涵和方法上看“场外征用”

以上主要是从“史”的角度探讨了“场外征用”的史实。或许有人会说,一种文论的建构是由“场外”和“场内”两部分需求所共同构成的。“场外”是一种文论形成的外在因素,与“场外”所对应的“场内”因素是决定文学理论最终形态的关键因素。确实,上面论述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场外”,也就是社会、哲学思潮、其他学科知识等因素对文论建构所产生的影响,而没有涉猎到“场内”。问题是,“场外”和“场内”是否可以截然分开?抑或说,文学自身或者说文论内涵是否能脱离“场外”因素而独立存在?下面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

这需要从文论的概念谈起。何谓文论?现在人们赋予它的一般界定是,文论是指研究有关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和原则的一门学科。从这个界定中发现,文论其

实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的研究;二是对社会作用的原理和原则的研究。文论虽然是有关文学艺术的理论,但其所涉猎到的绝非只是文学艺术本身,它与外在的社会也紧密相关。这说明一种文学理论必须得具备两种功能,即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问题和文学艺术对社会的作用问题。如果说前一种功能还可以在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来寻找答案,如语言和形式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对自身的研究来解决,那么后一种功能的实现——文学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参与、改造作用,则必须依靠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依存、互动才能够达到目的。显然,文论的内涵中也包含有对“场外”因素的要求,即这些“场外”因素也是构成文论的要素。更重要的是,严格说来就连前一种功能,即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的研究仅局限于文学内部也是不够的,也必须得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行——只有当拥有了相对科学的方法论和必要的背景知识时,才能把理论自身的构成和规律阐释清楚。这岂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场外征用”?

或许又有人说,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有排斥“场外征用”,只强调从文学到文学的文学理论,如崛起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就是一种纯文学理论的典范。“新批评”反对对文学进行外部研究,一贯标举文学内部研究的大旗,看上去的确是排斥文学外因素参与到文学研究中来,但最终也是无法避免“场外因素”之侵蚀的。

“新批评”(New Criticism)理论较为芜杂,在许多问题上,内部成员的意见不一。比如,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 - 1994)在《新批评》一文中就曾指出,“新批评”的前驱者之一,“瑞恰慈就非常重视读者而不是作品本身”;“新批评”的另一位重要成员,“艾伦·退特(Allen Tate, 1899 - 1979) [则]一开始就对历史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布鲁克斯 538)。“新批评”的主要倡导者J. C. 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 1888 - 1974),其主导性诗学思想是“本体论批评”。而所谓的本体论批评,表面上看来就是重视作品自身的意思。他在1934年出版的《诗歌:本体论札记》一书中,倡导人们把诗歌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加以研究,并似是而非地主张要回到“场外”的康德所提出的本体论批评上去。

这表明兰瑟姆并非真的要立足于文学本体并

排斥文学外的所有因素。1941年,当兰瑟姆在《新批评》一书中再次讨论诗歌的本体论问题时,又指出诗歌的本体性就在于它与“本原世界”的联系。这个与“本原世界”的联系就是指诗歌“表现现实生活”,并能够恢复“本原世界”的存在状态,即承认诗歌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与外部世界中一切,诸如宗教、道德等均有联系等(韦勒克 75 - 152)。无疑,兰瑟姆的文学本体论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文学研究的纯洁性。或者说当作一种文学理念进行宣传时,彰显的是其独立性,可一旦具体到阐述与分析上时,就必须得结合着外部世界来研究。譬如,如果说清楚何谓本体论,就必须得首先说清楚了何谓“本原世界”,而这样一来文学研究必然就与哲学思想和现代社会发生了关联。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新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勒内·韦勒克也是文学内部研究的倡导者。然而,在其著名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列出了一大通纯文学研究的好处后,又转回头来仔细讨论了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尽管为了区别文学的内部研究,他把这些研究命名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可这种行动本身也说明了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思路是难以走远的。如果想在文学的天地里彻底地展开翅膀,只能向其他的学科领域开放大门。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把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为“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韦勒克 32),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他并没有把文论单纯局限到纯文学中,所谓的“文学史的理论”就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理论。(乔国强 2009a: 74 - 87)

上面论述的主要是“新批评”与外部世界难以分割开来的关系。那么到具体到“新批评”理论自身,它又“征用”了“场外”的哪些因素?大致说来这种“征用”可以分成三种:一是对18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尤其是康德的美学的“征用”。如新批评的两名主将I. A. 瑞恰慈和兰瑟姆所分别提出的“想象力与知解力协和一致”,“想象与理性携手共居于这个真实世界”(转引自赵毅衡 8)等观点,都是从康德那里借鉴过来的。二是对形式主义文论,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征用”。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以说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方法,在新批

评的理论和实践中均能找到明显痕迹。如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客观现实的文学作品,与作品的作者和接受者无关。对“新批评”这一理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俄国形式主义的这一观点也正是“新批评”理论的精华之所在。还有,“新批评”中的重要术语,如反讽、张力、细读法等也是从俄国形式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启发的。三是对语义学批评等理论的“征用”。I. A·瑞恰慈著名的《美学基础》(*The Foundation of Aesthetics*, 1922,与C. K·奥格登和J·伍德合作)《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科学与诗歌》(*Science and Poetry*, 1925)等著作,都是他在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并借助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写就的。

当然,构成“新批评”的知识背景和理论学说并不止于这三方面。实证主义、唯美主义和心理学研究等,也都或多或少地给“新批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诸多启发。如果认为“新批评”这一批评范例还不足以表明所谓的纯理论是不存在的,那么再简单看一下自诩为在文学内部进行批评的先锋主义文论。诚如我们所知,以反叛传统为标志的先锋主义文论一直被我们视之为纯理论样板,即认为这种理论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文学自身的范畴上。其实,这个理论远不如我们想象的这般“纯洁”。

“先锋”这个词原本是个军事用语,1794年法国有一份军事杂志用“先锋”一词命名(Szabolcsi 49)。把这个词从军事领域引入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乃至文学艺术中来的是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 1760年-1825年)和他的门徒。由圣-西门的特殊身份可以联想到其语境中的“先锋”,一定会和“乌托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去世那一年出版的《对文学、哲学以及工业的观点》(*Opinions littéraires, philosophiques et industrielles*, 1825)一书中,不但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先锋艺术这一概念,而且还为先锋艺术家们制定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南”。该“指南”的核心思想便是,先锋艺术家们要保持自己的“先锋姿态”——要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和各种形式“散布新的思想”。总之号召艺术家们在构建未来美好社会中,要起到“先锋”带头的作用(Cf. Saint-Simon 343)。

无疑,先锋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不纯洁的,与社会生活、国家政治、公民职责等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的是艺术为社会服务的要求。这一现实说明一种文学艺术理论的产生往往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或某种思想忧戚相关。有关这点在唯美主义理论中也表现得格外明显。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唯美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而且似乎还是绝对、无条件的。这便使我们觉得这个流派是文学史上一个货真价实的纯艺术流派。殊不知这个理论流派与先锋主义一样,也与空想社会主义有关联。不同的是,前者推崇和信奉的是圣-西门,而后的文学理论主张主要是在查里斯·傅里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查里斯·傅里叶与圣-西门虽然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两人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圣-西门强调政府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傅里叶主张要去社会中心化,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小政府。所以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在其小说《莫班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 1835)的序言中,在对傅里叶宣扬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推崇备至的同时,强烈抨击了圣-西门所提出的艺术为道德和功利服务的思想(Egbert 344)。

从对先锋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简略回顾中不难看出,那些常被看作主张文学艺术“自治”的文论,其实从一开始就诞生于“场外”,在其构建和演化中又不断地把“场外”因素吸收、融合到理论文本中来。这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从中国学者那里也能找到相应的理论印证。

著名学者曹聚仁在为章炳麟《国学概论》一书所作的“小识”中曾说,学者的工作应该是“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曹聚仁 1)。文论就是由学者创造和写就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条原则也适用于学者的文论写作和研究:第一条原则说明一个作者在从事文论工作时,必须得有“精利的工具”。这个“工具”显然不可能是指文学自身,而是指具有前瞻性的精辟思想锻造出来的认识问题的方法。譬如柏拉图式的理念说,亚里士多德式的从具象中抽绎而出的演绎法,成为西方不少文艺理论家

的一个理论假设,即他们的文论构建都是以此假设为真理情况下推演而成的。这不难理解,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认识也都是依定一定的哲学原理的。如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理解,就必须得借助于道家哲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解读,就必须得参照着佛教。离开了这两种“思想工具”就会变得无所适从。第二条原则说明一切的文论其实都是具有功能性的,即具有“指引路途”的作用。

中外文论的发展事实表明,任何一种理论的创建,包括对已有理论的解读,都是要依据“场外”因素的。即便这种理论为人们“辟出新境界”,那也是在已有“境界”上发展、演化出来的。这说明“场外征用”是文学理论创见与研究中之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是导致文论变得“不纯粹”的主导原因。

三、从作品、文论实践角度看文论的“系统发育”

张江先生在《强制阐释论》一文中,反对“场外”的理论对“场内”理论的吞噬,认为这会使文论偏离了文学,因此他提出了“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必须坚持系统发育的原则”,建构出一种“符合文学实践的新理论系统”的倡议(张江 5)。

这一倡议的着眼点就是基于文学的问题要由文学自己来解决,即所谓的“系统发育”就是指文学系统内部的自我发育。换句话说,新构建出来的这个理论系统必须得与“文学实践”自身相吻合、一致。无疑,这个“系统发育”之说与反对“场外征用”的观点是互为体、相互补充的。总之,张江先生认为文学理论的构建一定要从“文学实践”这一逻辑点出发。

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何谓“文学实践”之说。文学实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学实践,可以指一位作家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广义的文学实践所包含的内容就广泛了,它不仅包括作家的创作过程,还包括作家在创作时所采用的具体策略、技巧以及在文学作品中所构建的那个文本世界。有关的具体策略和技巧在前面论述“场外征用”时已经涉猎到了,即这些策略、技巧的产生与运用都是离不开其他领域和学科的启发

与支持的。在该处需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中所构建出来的那个文本世界,也就是透视一下这个世界是与什么东西关联在一起的。

文本世界虽然是文学作品中的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虚构出来的艺术世界就是隔绝而孤立的。相反,它与现实世界有着一种撕扯不断地关联。彼此间关联的媒介有许多种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创造这个文本世界的人——作者。

文本世界是由作者一手搭建起来的。问题在于,作者到底是依据什么来构建这个文本世界的呢?这个创建文本世界的作者又是由什么构造出来的?这些问题已是老问题,似乎无须再赘言的必要。对诸如作者不是真空世界里的超然物种,而是由现实社会、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塑造而成的;还有这个社会化、历史化中的“人”(作者),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投射进其所构建的那个文本世界中的种种说法,我们都了然于心。作为一种“常识”知道是一回事,明白其中“投射”的原理和过程又是一回事。为了更好地说明作者、社会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是需要“征用”一下文学之外的理论。

法国符号学家高概与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E·本韦尼斯特,为了更好地阐释清作者、社会和文本间的关系,发明了一个“述体”(instance énonçante)概念。对何谓“述体”,两人的界定不完全一样,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强调“述体”是“话语产生的中心”。为何会把“述体”与“话语产生”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他们看来,“述体”不但是指作者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即便是“不言语”,它也能“感受痛苦,感受愉悦”(高概 21),而且“述体”还能反射现实,并能使事物和人产生意义。这个概念无疑有些抽象和晦涩,如果用较为通俗的话来解释,可以总结成两层意思:一、人的思想意识并非完全是由大脑控制的,通常默不作声,被我们所忽略的身体其实也在控制着人的思想意识。它的控制方式是,用其所独有的存在方式和经验感受来决定言说者的作者;二、作者的身体看上去好像是独立自主的,其实不是,它总是被外界所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换句话说,身体的存在和感受并非是独立的,而是受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制约的,即身体处于何种时代、何种环境,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存在方式和感受经验(参见乔国强 2009b: 74-80)。

高概和 E·本韦尼斯特绕着这么大的一个弯,无非还是说明一个问题:人与外部世界是难以分割开来的。只不过他们比以往的理论家往前更为推进了一步,从“身体”的角度把人与外部世界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即说明任何一个作者的存在都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作者自身所具有的这种社会属性,就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属性也是“杂色”的。

既然文学作品本身都是不“纯粹”的,那么论述、研究文学作品的“理论”怎么可能“纯粹”?换句话说,解读或评价一部充满复杂思想观念或社会因素等影响的文学作品,所使用的与之相对应的文论都会程度不等地存在“场外征用”的问题。譬如,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叶的德国“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就是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从“狂飙运动”本身来看,这是一场声势浩大,席卷了整个德国的文学运动。青年时期的歌德、席勒等都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坚力量。多数学者认为,这场由当时的作家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 1752 - 1831)在1776年创作的同名剧本而得名的运动,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面比启蒙时期更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杨周翰、赵萝蕤、吴达远 108 - 35)到底该如何分析和评价这样一场反映当时社会思想和政治文化诉求的文学运动?如果只从文学内部而全然不考虑“场外征用”的话,恐怕既不能深刻地揭示出这场运动的起因及其深刻的内涵与外延,也无法诠释清楚这场运动对德国乃至欧洲文学和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狂飙突进”时期的那些文论也都是通过“场外征用”构建而成的。这一点从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论家约翰·高特夫里特·赫尔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 - 1803)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以及所提出的文学主张等都可以显示出来。赫尔德尔曾学过医学和神学,还在教会学校里做过助理教师和教会牧师。他曾在巴黎游历过,接触过卢梭的著作,与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还有过交往。他在德国结识了莱辛和歌德,歌德还推荐他到魏玛充当教会总监督和市立教堂作首席牧师。总之,他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以至于我们很难对其做出分割,即哪一部分的赫尔德尔是神

学家的赫尔德尔;哪一部分的赫尔德尔是医学家的赫尔德尔;哪一部分的赫尔德尔是文学理论家的赫尔德尔?他在撰写《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 - 1791)这样一部论及“世界各国的自然和人民、语言和风俗、宗教和文学、艺术和科学,以及历史地理等”(冯至等 113)鸿篇巨制时,难道会把其头脑中的有关医学、神学以及哲学思想都要统统屏蔽掉,然后再以文论家的身份从事写作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赫尔德尔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有分量的文艺理论专著,正是因为他借鉴、融会了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精华,即恰恰是“场外征用”的优势成全了他。这样的事例绝非是偶然的,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坛上的一件黑人作家与犹太作家之间的一场强硬“对话”,也反映出“场外征用”的必然性。

这场“对话”最初是由对黑人文学作家的不同理解和评论而引发起来的。美国犹太学者,同时也是批评家的欧文·豪(Irving Howe, 1920 - 1993)在评论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 1908 - 1960)和詹姆士·鲍德温(James Baldwin, 1924 -)的作品时,褒扬了赖特,而贬抑了鲍德温。这引起了另一位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 1914 - 1994)的不满。他指责作为犹太人的豪并不了解黑人,因而也没有资格对美国黑人作家的创作指手画脚。豪对埃里森的过激反应表示不解,因而又撰文解释说他的评论仅限于美国黑人文学作品的评论,除此之外,不包含其他的意思。这篇原本没有什么恶意的文章彻底激怒了埃里森,他先是质问豪为何对他的指责不予以理会;又愤怒地指出,美国犹太人不要以为自己的肤色和白人一样,就可以以白人的口吻来教训黑人;进而还提醒说,犹太人也是移民,而且还是后于美国黑人的移民。

显然,这场看似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文学系统内部展开的,而是自始至终都处于“场外征用”之中。换句话说,犹太批评家与黑人作家看似讨论的是文学问题,其实离着文学自身甚远,论争来论争去都没有离开种族、肤色以及地位问题。这也说明文学这个系统是不可能离开社会系统、族裔系统等独立发育的。这场争论消停之后,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还

以此为背景写了一篇名为《房客》(The Tenants, 1971)的小说,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作家的创作也都具有“场外征用”的特点。更有意味的是,其他理论家对《房客》的解读也充满着“场外征用”的意味,如伊斯卡·奥尔特认为,马拉默德的《房客》是一部有关末世学的小说,讲述了人类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所发生的暴力、绝望和文明的堕落(Alter 172)。美国文学批评家谢尔顿·J·赫什诺认为,“《房客》本质上的象征意义是黑人与白人冲突的寓言[……]暗示了文明的白人反对野蛮的黑人,爱与恨相对峙,理智与本能相冲突”(Hershinow 92-93)。以色列学者埃米莉·米勒·巴迪克(Emily Miller Budick)则认为马拉默德欲表达一种黑人与犹太人应该结成联盟的思想(Budick 11-13)。

以上三种评论没有一种是针对文学自身的艺术性的,从事的全部是与哲学、种族、历史、政治有关的主题性释说。这又再次证明了“场外征用”不但不是文论的弊端,相反是文论构架和发展的一种正常态势。

结 语

说文论“场外征用”的合理性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从史上来看,文论“场内”、“场外”因素是孪生的,自古皆然;(二)从文论自身的内涵看,“场外”与“场内”因素互为表里,文论源自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又阐释和引导文学艺术的发展走向;(三)从文学实践的角度看,“场内”“场外”这两种因素有机地纠缠在一起,无法将它们剥离开来。总之,让文学批评和文论构建局限于在“文学系统”之内,而不进行“场外征用”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场外征用”既可以说是出于文学批评实践和文论构建的某种需要,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文学批评实践和文论构建的内涵及外延。

张江先生之所以在《强制阐释论》中提出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场外征用”问题,我想可能是基于以下两种语境:其一,当代西方文论对“文论”的界定过于笼统和宽泛了,把一些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文论的东西也看作是文论,即借跨学科之际模糊了文论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其二,当代西方文论中,有过于偏重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道德等

方面的倾向,从而使原本用来阐释、批评文学作品和现象或引导文学艺术走向的文论,被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伦理道德等所绑架。抑或说,使原本用来让读者进行认知、审美、娱乐等活动的文学艺术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文学艺术成为文论的奴仆,专事用来阐释文论的正确性。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张江先生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是非常及时的。这与文论本身是否含有“场外”因素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论的“场外征用”不单纯是个应不应该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资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到底该是以何种态势出现的问题。

其实,西方的一些理论家也意识到了文论所面临的窘境。早在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 1891-1982)就提出了“文学性”问题,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是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近期,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奥尔布赖特针对当前理论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时也说“我信仰一种更接近实践的理论,我信仰那种让人们更加接近和热爱文学文本、音乐作品的理论。我不喜欢‘俯视’姿态的理论。我愿意去看作品,并从中发现一些东西。[……]我认为最好的批评同时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关注宏大的视野,也关注具体的情感与词句”(顾悦 6)。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即文论如何才能更好地成为文论的想法下,本文才不揣冒昧地与张江先生探讨,以便更好地推进这个话题,为文论发展和建设提出一点管窥之见。

注释[Notes]

① 需要注意的是,兰瑟姆所说的康德的本体论批评指的是康德早期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不是1770年后的康德。因为1770年从发表《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起,康德就从自然科学转向哲学,从探索自然的奥秘转向心灵的奥秘,其哲学观也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他在这一时期是反对本体论研究的,他认为“物自体”在经验之外,是无法认识的。参见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lter, Iska. *The Good Man's Dilemma*. New York: AMS Press, 1981.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

- 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 [Aristotle and Horace. *Poetics and Ars Poetica*. Trans. Yang Zhouh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克林斯·布鲁克斯“新批评”,《“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 [Brooks, K. . “New Criticism.” *Selected Essays on New Criticism*. Ed. Zhao Yihe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8.]
- Budick, Emily Miller. *Blacks and Jew in Liter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曹聚仁《章炳麟国学概论·小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Cao, Juren. *An Introduction to Zhang Binglin's 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s Company, 2009.]
- 陈良运《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 [Chen, Liangyun. *Selected Works on Chinese Poetics across Dynasties*.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5.]
- 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Coquet, Jean Claude. *Semiotics of Discourse*. Ed. and Trans. Wang Dongli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Egbert, Donald D. . “The Idea of ‘Avant-Garde’ in Art and Politic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3. 2 (1967): 339-66.
- 冯至等《德国文学简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Feng, Zhi, et al. *A Brief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 顾悦“文学的未来与文学理论的出路——访哈佛大学丹尼尔·奥尔布赖特教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二十一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
- [Gu, Yue. The Fu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Way-out of Literary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Daniel Albright. *Studie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21.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 Hershinow, Sheldon J. *Bernard Malamud*.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80.
- 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Liu, Xi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 Guo Binhe and Zhang Zhu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Ransom, John Crowe. *Beating the Bushes, Selected Essays*, 1941-1970.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2.
- Saint-Simon, Henri de. *Opinions littéraires, philosophiques et industrielles*. 1825 (Paris, 1925), pp. 341-42.
- Szabolcsi, Miklós. “Avant-garde, Neo-avant-garde, Modernism: Questions and Suggestion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 No. 1,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quiries, Reflections and Speculations (Autumn, 1971), pp. 49-70.
-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 [Wellek, R,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al Press, 2005.]
- 乔国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上海大学学报》3(2009):74-87。
- [Qiao, Guoqiang. “Wellek's Concept of Literary History.”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3(2009): 74-87.]
- “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思想战线》5(2009):74-80。
- [---. “Narrated Subject, and Time-Space of Literary History Narratives and Their Ethic Relationships: Exemplified by Wang Yao's *History of China's New Literature*.” *The Ideological Front* 5(2009): 74-80.]
- 童庆炳《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Tong, Qingbing.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杨周翰 吴达远 赵萝蕤《欧洲文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 [Yang, Zhouhan, et al. *A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6(2014):5-18。
- [Zhang, Jiang. “coercive interpretation.” *Literary Review* 6 (2014): 5-18.]
- 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 [Zhao, Yiheng. *New Criticism Revisited*.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责任编辑:王嘉军)